

两会关注

如何守护青少年的心灵家园

——代表委员热议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本报记者 林焕新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愈发受到社会关注。去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专门下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文件,要求进一步提高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加强专业支撑和科学管理,着力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

如何守护青少年的心灵家园?学校、家庭、社会应如何作为?今年全国两会,多位代表委员对此建言献策。

1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学习心理健康教育是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是千家万户幸福安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蚌埠市第一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总校长崔建梅说。

崔建梅调查发现,由于学校、家庭等社会问题日益复杂,目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形势不容乐观。她坦言:“这是学校教育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

如何解题?崔建梅建议,国家层面统一组织编写心理健康教育教材,教材从小学中高年级起步,至高中毕业,统一序列。内容可以包括心理健康课程、心理健康专题教育、心理辅导等内容,让心理健康教育有章可循。

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大学党委书记焦新安同样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缺乏系统的课程体系和完整的教材体系,各学段互相脱节。对此,他建议优化顶层设计,确立一体化心理育人理念,推进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咨询服务、预防干预“四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格局,横向拓展、纵向贯通,不断强化大中小学资源整合、衔接。

全国政协委员、洛阳理工学院副院长马瑞则关注到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这块“短板”。“2020年,一项针对全国3142所小学及941所初中的调查显示,我国仅有19.16%的城市学校及2.64%的农村学校设有专职心理健康

教育教师。”马瑞建议,加强精神科等急需紧缺人才的培养,优化卫生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课程建设。同时,构建以专家协会为支撑、专业人士为骨干、志愿服务团队为补充的社会心理服务队伍。

“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是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短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许湾乡希望小学校长李灵呼吁,“要在农村中小学配备相应比例的心理教师,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师的组织培训工作。”

2 科学研判,保护青少年隐私

“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强迫等情绪,一直被严重低估,我们要做到早发现、早筛查、早治疗。”去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青海民族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李莉娟提交了“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同年11

月,教育部予以回复。

教育部在回复中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这是推动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的一项重要举措。

“但也要注意,抑郁症量表筛查统一纳入学生体检,部分学生被贴上‘抑郁症’标签后,容易受到排斥、被孤立,对个人精神健康、学习生活造成不利影响。”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表示,现有的筛查量表难以对青少年是否患有抑郁症作出准确判定。同时,如果不能严格保护学生隐私,可能加重学生心理负担,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因此,施卫东建议,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应专门制定适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筛查量表,结合学校表现、家庭日常、设备诊断等多种途径,综合判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避免“一检定性”。同时,淡化抑郁症“疾病”的概念,缓解学生精神压力。“筛查体检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可考虑以学年为单位,未成年学生及家长可自主选择筛查时间和医院,医院对结果异常者一对一告知,同时严格限定学校获知筛查结果的人员范围。”施卫东说。

全国政协委员、东南大学教授吴智深建议,遵循人性化、预防性、教育性等原则,在全国建立统一的中小学生学习心理危机预警和干预机制。在预防上,要普及心理健康常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建设;在预警上,学校需要设立“心理预警监测中心”,最好每学期进行一次学生心理测评;在干预上,需要掌握学生的危机情境及其反应,制定符合学生身心状况的干预方案,并由具有专业心理咨询资格的心理咨询师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3 家校社协同织起防护网

“对国内19所涉农高校32个学院的调查发现,80%以上中、重度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根源都在原生家庭。”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副院长马瑞燕说。

“受限于教育水平,绝大部分农村中小学生学习父母缺乏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也就无法理解和应对孩子们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李灵说。

今年全国两会,马瑞燕专门提交了“关于加强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家庭预防”的建议。她建议,为所有育龄家长开设家长课堂,普及抑郁症、不同年龄段儿童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相关知识;编撰出版少年儿童心理学科普类书籍,制作少年儿童典型心理问题表现的科普读本和视频,提高家长对孩子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度和识别能力;借助主流媒体,宣传、普及心理、精神疾病等相关知识;开通免费公益心理健康咨询热线、设立社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等。

呵护祖国的花朵,全社会应当形成合力,织起一张防护网。

民盟中央建议,整合各方资源,提升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处置能力。对于实践中的难点,民盟中央给出具体建议:加大统筹力度,成立市、区、街道三级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大力培养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等人才,补齐人才短板;建立心理咨询求助便捷平台;加强闭环协作,建立学校、社区、医院等协调联动信息共享机制等。

推进综合素质评价在中高考的应用,改变招生中分分计较的现象,在全社会形成新的教育观和成才观。”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花园小学校长曹永鸣注意到,目前,一些地方的考试命题还存在机械、重复的倾向。她表示,要推动命题朝着国家和社会对未来人才需要的方向改进,“这样才能减少家长看重死记硬背、反复刷题的行为,更好地释放学生自主学习的潜能”。

“如果不把中高考‘指挥棒’跟‘双减’落实途径协调起来,部分家长的困惑和焦虑仍难以消除。”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晓进认为,“双减”是一种手段和途径,并不是目的本身。为此,他建议,要切实落实教育评价改革,推进义务教育综合素质评价标准落地,同步深化高考、中考改革,确保命题方向与“双减”精神相吻合,让考与学更匹配。

让孩子上“好学校”,是每个家长心中的期盼。刘希娅发现,部分地区在落实属地招生政策上打了折扣,一些学校为了“掐尖”改变正常的教学进度,超前超纲教学,这也是引发家长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她建议加大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严格执行属地招生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认为,要大力缩小校际教育资源配置差距,尽快改变老百姓心目中把“好学校”视为稀缺资源的局面,办好家门口的每所学校。张志勇建议,一方面,通过加大优秀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力度,深化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均衡配置到域内普通初中等方法,分好“蛋糕”,创造优质教育资源配置新格局;另一方面,要做好“蛋糕”,通过制定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清单,提高区域内底部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等,尽快使每所学校都能成为人民群众身边的“好学校”。

“双减”后如何为家长减负赋能

人,家长要发挥好家庭教育的积极影响,营造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围。”崔建梅认为,“双减”后,家长应该充分利用多出来的亲子时间,加强体育锻炼和劳动教育等,培养孩子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习惯品行,促进孩子全面发展。

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剑萍看来,家长要着眼于孩子的终身发展,要让今天的学习能为孩子一生的发展奠基,而不是一味地让孩子早学、多学、快学。“很多家长的注意力往往放在孩子的短板上,对如何发现并发挥孩子的特长关注度不够。”李剑萍建议家长把孩子的全面发展与特长发展结合起来,给予孩子更宽广的舞台。

并非所有家长都拥有科学的教育观,家长同样需要“教育”。

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

“这说明家庭教育已经不是‘家事’,父母们必须‘依法带娃’。”崔建梅建议,社会和学校要加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宣传普及力度,各省市要结合实际出台实施细则,落实各部门职责,此外,学校还可以依托法治副校长开展普法工作,让家长明确身为监护人的职责。

学生的健康成长是学校、家庭乃至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学校因其在教育领域的专业性和其联系千家万户的特殊性,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从目前‘双减’实施情况来看,

在一些地区,家庭、学校协同程度不高,还没有形成应有的合力。”韩平认为,学校要通过家长课堂、家长会、家访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让家长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并要对孩子的成长有合理期待,为孩子规划适合的成才道路。

倪闽景注意到,现实中,教师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基本上是经验型传授,缺乏科学性和专业性。他建议,将教师的家教指导力作为教师专项能力列入教师入职基本能力培养和评价体系中,“还可以在有条件的大学开设家庭教育专业或学科,进一步提高家庭教育的学科建设”。

在推动家庭教育工作中,政府和社会也应承担重要责任。全国人大代表、东北育才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校长高琛建议,进一步完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开设公益性网上家长学校和网络课程,提供更具便捷性、互动性的指导服务。同时,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相关经费列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和财政预算,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顺利开展提供经费保障。

制度变革,破除家长教育焦虑

采访中,多名代表委员表示,需要聚焦家长的焦虑根源,破解深层次问题,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导向。韩平认为,要按照《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加快改革进程,“特别要加快高校招生方式改革和高中招生方式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张健、中国教科院体卫艺研究所所长吴键接受中国教育报刊社融媒体访谈

体教融合要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理念

两会政录

本报讯(记者 龚萍)当下体教融合急需做什么?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又是什么?3月6日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张健,中国教科院体卫艺研究所所长吴键做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E政录”演播室,就“后冬奥时代,如何深化体教融合”这一话题与网友分享了他们的思考和建议。

访谈中,张健呼吁,要打破行业壁垒,把体育部门的竞赛体系和训练体系引入学校,为国家培养更多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吴键认为,体教融合不仅要服务于竞技人才的选拔,更要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让广大青少年能够在体育锻炼的过程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学生耐力、速度、力量水平低,超重肥胖、视力不良、身体姿态不正等问题,是因过于重视文化成绩、学业课业负担过重和不重视学校体育工作引起的。”吴键表示,体育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学校有责任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学校应重视体育,为体育教学和训练竞赛提供

充分的物质保障。

体教融合不是简单地将体育和教育两个部门的资源相加,而是理念上的一场变革。张健认为,当下体教融合迫切需要解决3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应该做好学校体育的顶层设计,建立学校运动项目的竞赛体系和训练体系,同时要提升学校体育教师的运动技能水平;第二个层面,要在学生、家长、教师中,在全社会培育学校体育文化;第三个层面,要建立完整的体育教育工作者培养体系”。谈到体教融合的难点,吴键认为:“还是理念问题,要回归教育的初心,回归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健康和成长上来。”

在后冬奥时代,如何让“双奥”独特资源和社会体育资源更好地为校园体育服务?张健建议:“在学校体育教师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请专业体育俱乐部进校园的方式,帮助学校提升体育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担负起课后1小时训练的专业指导任务。”



扫码观看直播回放

两会观察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野蛮生长现象得到有效遏制。然而,非学科类培训市场却逐渐升温,受到很多家长的青睐,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一课难求的现象。

“不可否认,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作为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缓解了校内非学科类教师师资、场地、经费不足与家长、学生多样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为青少年全面发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以及相关产业发展、专业人员就业作出了贡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说。

目前,学科类培训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监管体系,非学科类培训监管能否借鉴?

“大多数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与校内教育差异性大,互补性强,且不属于刚需,因此不应简单照搬照抄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的目标与办法。”刘林认为,非学科类培训监管不能搞“一刀切”,应根据各学科门类的不同特点,实行分类管理、精准施策。与中考、高考关系密切的,可以参照学科类培训进行管理;对于其他门类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应当遵循发展规律和实际需求,以多样化手段引导其健康发展。

治理非学科类培训机构,首先要明确主管部门。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发现,目前全国已经有21个省份明确了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相应主管部门,但仍有多个省份没有明确主管部门,大部分省份未出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分类标准和审批流程。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原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韩平则建议,尽快出台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条例,从法律层面赋予业务主管部门行政审批权限,明确“培训许可证”的审批类型和形式,进一步厘清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责。同时,在审批需求迫切、立法过程较长的情况下,建议由国务院授权给各省级人民政府,解决当前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审批权的堵点问题,推动校外培训分类管理全面实施。

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监管问题上,周洪宇认为,要加强资金监管和价格监管。培训机构应缴纳预收费风险保证金,最低额度应该不低于培训机构收取的所有学员单个收费周期的费用总额。有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价格管理,遏制非学科类培训市场营销急速升温、价格过快上涨,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要保障公益普惠属性。通过为他们提供参与学校课后服务机会等措施,支持其向公益性、非营利性机构转变,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刘林说。

为什么要规范“公参民”学校

两会问答

网友@栀子花开问:最近多所“公参民”学校陆续更名,作为学生家长,我想知道为什么要规范这类学校?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特级教师王家娟答:

作为在教学一线工作了36年的老教师,我也很关注“公参民”的话题。“公参民”学校是指公办学校举办或参与举办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参民”办学模式,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

随着社会对教育公平要求的提高和教育法规制度体系的完

善,“公参民”办学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引发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比如,一些学校违规提前招生、跨区域招生、“掐尖”招生等行为,加重了家长负担,破坏了教育生态,损害了教育公平。2021年7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提出全面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公参民”办学。

全面规范“公参民”学校势在必行。让公办学校回归公办,社会力量举办民办,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才能维护教育的公平性和公益性,让人民群众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切实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缓解教育焦虑。

(本报记者 曹曦 整理)

代表委员热议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升温——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需精准施策

本报记者 焦以璇

(上接第一版)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倪闽景指出:“家长需要教育观念的更新。”他表示,家长以为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学习是对子女教育的重视,要比“躺平”好得多。但是,“重视孩子教育的最好方式恰恰是更多的陪伴、倾听和支持”。

“双减”后,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一中学副校长贺颖春发现,部分家长对培养孩子的目标比较明确,对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和所需的核心能力也比较了解,在拥有良好亲子关系的同时,还能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但同时她也观察到,一些家长的焦虑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陷入不断为孩子加码增负的困境。

“家长需要更积极地应对,思考如何把焦虑转化为和孩子一起向上改变的动力。”贺颖春说。

教育教学有自身规律,孩子也不是机器。倪闽景指出,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结果表明,校外补课与学生成绩相关性并不大。

“如果家长观念不转变,学校减少作业量,家长就自己布置作业给孩子。校外培训机构严格监管了,家长就转向家教和团课。这样一来,‘双减’工作不仅大打折扣,甚至还会带来更无序的校外补课。”倪闽景提醒道。

更新观念,减负不减家长责任

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学生闲暇时间增多,与家长接触时间变长,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在不少代表委员看来,家长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的改变是决定“双减”政策能否落地的关键因素。

“家长应该明确减负不代表减轻家长的责任。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责任



视觉中国 供图